

《淮南子》 生命艺术思想研究

● 赵欣
◎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淮南子》

生命艺术思想研究

· 赵欣◎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淮南子》生命艺术思想研究 / 赵欣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308-14710-1

I. ①淮… II. ①赵… III. ①杂家—中国—西汉
时代 ②《淮南子》—研究 IV. ①B234.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00559 号



《淮南子》生命艺术思想研究
赵欣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213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710-1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bs.tmall.com>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形而上的探寻——“道”	(23)
第一节 “道”释义	(23)
第二节 以“道”为起点的宇宙生成论	(35)
第三节 《淮南子》之“道”的生命美学意蕴	(44)
第二章 形而下的考察(一)	
——生命的构成:“形”“气”“神”	(50)
第一节 “形”“气”“神”的概念分析	(52)
第二节 《淮南子》对“形”“气”“神”的分析	(56)
第三节 从“形”“气”“神”至“精神”	(63)
第三章 形而下的考察(二)	
——生命的现实存在:人性思想与人性之美	(67)
第一节 《淮南子》人性思想辨析	(70)
第二节 《淮南子》人性思想考察	(80)
第三节 理想人格的构建	(117)
第四章 《淮南子》生命思想的升华	
——艺术论	(128)
第一节 真与至情——《淮南子》艺术论的创作范畴	(134)
第二节 “君形者”——《淮南子》艺术论的审美范畴	(140)

第三节	文与质——《淮南子》艺术论的审美理想	(146)
第四节	知音共鸣——《淮南子》艺术论的鉴赏范畴	(154)
第五章	《淮南子》生命艺术思想的生态意义	(160)
第一节	以道观物——《淮南子》生态思想的论述视角	(161)
第二节	自然与生命——《淮南子》生态思想的具体呈现	(170)
第三节	自然与无为——《淮南子》生态思想的伦理表达	(175)
结 语		(182)
主要参考文献		(185)
索 引		(190)
后 记		(192)

绪 论

一、研究概况^①与研究方法

在今人看来,《淮南子》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一部广纳百科的巨著,它在思想、政治、军事、文学、美学、自然科学等方面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其融汇诸家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所谓“综合”的言说方式。自《淮南子》成书之后,两汉时期关于此书的讨论甚至争论就一直存在。^②这种热闹非凡的讨论景象自然与《淮南子》一书本身所具有的可阐释性密切相关,但其编著者刘安的特殊身份,其与当时最高统治阶层的微妙关系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事实上,这一时期对《淮南子》一书的所谓关注,或体现在政治层面的以书观人,或体现在工具层面的因论用书。平心而论,真正能从学理层面对《淮南子》进行较为详尽的阐释和较为公允的评价的著作并不多见。可以说,在《淮南子》成书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本书的政治表征含义远远超过了其学术价值,从而也掩盖了对其学术价值应有的重视。甚至从两汉至明代,没有研究此

① 关于淮南子研究综述性的文章有:陈丽桂依据所搜集到的一百余种中外文资料撰写了《〈淮南子〉研究八十年》、杨栋《二十世纪淮南子研究》、高晓荣《新时期大陆学界淮南子研究》;另有,陈广忠主编的专著《淮南子研究书目》。本书所述研究概况择其重点加以整理并加入新近研究的若干著作文章。

② 据陈广忠《淮南子研究书目》所言,两汉时期,论及《淮南子》见于记载的人物就有汉武帝、刘向、刘歆、扬雄、王充、许慎、马融、延笃、卢植、高诱、应劭等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史记》中也有多处引用。

书的专著问世,现存注书中只有许慎、高诱的注本^①,对其评论也只散见于个别典籍之中,如:扬雄《法言》中评其为“乍出乍入”“淮南鲜取焉”,刘知几《史通》说其“牢笼天地,博及古今”,高似孙《子略》、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只言片语的论述。

直至清代,清人严谨的治学态度无疑影响到对《淮南子》一书的研究。受当时学术氛围的影响,众多学者对此书进行文字、版本、考据方面的相关研究。其中,王念孙在其所作《读书杂志》第十二到第十六册中对《淮南内篇》进行了较为详尽整理。清以后至当代,对《淮南子》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在考据、注释方面,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杨树达《淮南子证闻》、何宁《淮南子集释》、张双棣《淮南子校释》、陈广忠《淮南子译注》、陈一平《淮南子校注》、刘康德《淮南子直解》等书为研究《淮南子》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思想方面,自胡适作《淮南王书》始,学者们对于《淮南子》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大致而言,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淮南子》所属派别的研究。对于《淮南子》所属派别,主要有杂家说、道家说和儒道融合说。自《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杂家之后,直至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将其列为杂家。近代学者沿袭杂家说的主要有范文澜《中国通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有诸多学者认为其为道家著作,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顾颉刚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认为:“是以道家之说为主而略佐以儒家之说;又杂载许多西汉初叶的物事的。”另有提出儒道融合说,如徐复观就认为,书中经常体现出儒、道两家思想抗争的情形,并且儒家还占据上风。陆玉林《论〈淮南鸿烈〉的儒道整合》也论证了这一观点,丁原明《〈文子〉与〈淮南子〉思想之异同》也支持此看法。

对中国传统的思想家及其著作进行分门别类式的派别研究一直是治传统学问的普遍思路。这种区分派别的方式,向前追溯甚至可以至诸子时代。这样做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既可以从历史的派别流变中梳理其观念的发生、发展;又可以从横向的比较中彰显其所论的新意、创建。然而,对于思想观念颇为复杂、论述倾向变换闪烁的《淮南子》来说,硬生生将其归入某家,是否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本就多元的思想中存在意义生发的可能性?或许可以说《淮南子》的主体思想侧重于某一派别的基本观念,但并不能将其

^① 许注、高注现今已混合为一,也就意味着完整的许慎注本和完整的高诱注本都不存在。

所论完全进行一种“画地为牢”似的圈定。唯其如此,才是以一种较为开放的眼光来审视这部思想复杂的著作。

第二,《淮南子》重要概念辨析。这一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其中“道”和宇宙论的探讨。关于“道”的论述主要有: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中认为《老子》书中的“道”含义尚不够明确,《淮南子》则对“道”做了系统的说明,把它作为自己的宇宙观的最高范畴,并对《淮南子》中的“道”进行了规定:一是“道”是无限的存在;二是“道”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和依据;三是“道”是宇宙的原初状态,它自然化生天地万物。^①葛兆光认为《淮南子》中“道”置于天、地、人之上,贯穿了自然、社会、人类自身三大领域:“在《淮南子》看来,‘道’不仅是一切的本原及其合理性依据,也是宇宙间一切的支配性力量,甚至还隐隐似有人格与意志的神灵。它贯穿了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三人领域。无论鬼神还是人类,无论幽冥还是人间,‘道’都昭示了必须遵循的法则,而道的法则,一是柔弱清静,二是自然无为,三是返本复初。”^②张运华在《〈淮南子〉对道范畴的理论深化》中认为,“道”是《淮南子》一书的重要范畴,《淮南子》通过对“道”的继承发展,深化了《老子》关于“天道自然无为”和“道化生万物”的思想,并形成了系统的自然宇宙观。^③丁原明《淮南子道论新探》中,以《淮南子》对“道”的论述为根据,指出其合于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所言黄老之学的思想特点,当属黄老道学,并将其道论提升至宇宙论哲学的高度,与《老子》之道进行了对比。^④此外,刘爱敏《〈淮南子〉道论研究》也以“道”为论述核心较为全面地阐释了《淮南子》一书的特色。

与《淮南子》的道论研究一脉相承,对其宇宙论的研究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目光。先秦道家的宇宙观主要是讲宇宙的构成,而《淮南子》虽然也讲宇宙构成,但更为主要的是讲宇宙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关于《淮南子》宇宙论思想的研究涉及:李晓林《〈淮南子〉中的宇宙起源思想》,从宇宙起源、物质演化两方面对《淮南子》相关思想做出剖析。此外,还有于首奎的《试论〈淮南子〉的宇宙观》、钟肇鹏的《论〈淮南子〉宇宙观的唯心主义性质》、顾伟康《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宇宙论体系——论〈淮南子〉的宇宙论》等。

第三,《淮南子》与先秦诸子的关系。其中以研究《淮南子》与老庄思想

①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页。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③ 张运华:《〈淮南子〉对道范畴的理论深化》,《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

④ 丁原明:《淮南子道论新探》,《齐鲁学刊》1994年第6期。

的关系为最多,主要有朱锦江《〈老子〉与〈淮南子〉》、王叔岷《〈淮南子〉与〈庄子〉》、周骏富《〈淮南子〉与〈庄子〉之关系》、邹丽燕《〈淮南子〉内篇与老庄思想之关系》及丁文宏、蔡友和《老子“无为”思想探微——兼论〈淮南子〉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扬弃》等。研究《淮南子》与儒家、墨家、黄老关系的文章也有不少。此外,还有对《淮南子》与《吕氏春秋》关系的研究,包括: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思想研究》,雄铁基在《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中将《吕氏春秋》与《淮南子》进行了比较,任继愈、葛兆光对于此问题也都有相关论述。

第四,从某一角度切入研究《淮南子》。对《淮南子》哲学、历史、法律、逻辑、政治、心理、美学、文学角度的专向性探讨都有见到,此处仅谈和本论题相关的文学、美学方面的研究概况。从文学角度对《淮南子》进行研究主要集中于几部文学史著作中,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都从行文、文学观方面对其做出了探讨。从单篇论文来看,党圣元《〈淮南子〉对于情感与审美之关系的认识》、张啸虎《论〈淮南子〉的文采》《论〈淮南子〉的文学特色》、于大成《〈淮南子〉的文学价值》等则分别从文章、小说、神话角度对《淮南子》进行了专题性研究。

从美学的角度来说,无须讳言,此书并非一本纯粹的美学书籍,但其中确实包含着大量的美学内容和倾向。前人对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多散见于美学史著作中,如敏泽在其《中国美学思想史》中辟专章对《淮南子》的美学思想进行介绍;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中有《淮南鸿烈的美学思想》专节,认为其:“对气象宏伟博大、质朴强悍的汉代艺术所表现的一般特征做了美学的概括,很好地反映了汉代艺术所表现的时代精神”,“淮南鸿烈上承先秦,下启魏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环节”;王振复在《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中将《淮南子》作为黄老之学的典型文本进行分析;施昌东《汉代美学思想述评》中论述了《淮南子》中对于美的看法。单篇论文讨论《淮南子》美学思想的有:周来祥《〈淮南子〉的哲学精神和美学思想》、徐春凯《〈淮南子〉文艺思想——汉初黄老思想在文艺领域中的集中反映》、黎孟德《〈淮南子〉美学思想初探》等。

第五,对《淮南子》的综合研究。此类研究著作主要有:孙纪文《淮南子研究》着重从经学、历史哲学、诸子思想、文学特质诸方面探讨《淮南子》的价值;杨有礼《〈淮南子〉与中国文化》综合论述了《淮南子》的政治观、教育观、军事理论以及其与道教的关系;马庆洲《淮南子考论》对《淮南子》一书的历代流传状况、思想成就进行了细致地考察分析、归纳总结;陈静《自由与秩序

的困惑——〈淮南子〉研究》，从问世与流传、版本系统、淮南王生平研究以及哲学思想等方面对《淮南子》做出了比较全面的论述；雷建坤《综合与重构〈淮南子〉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淮南子》诞生、时代背景、理论重构以及它与道家、儒家的关系等角度进行了相关论述。

此外，除了本土学者的研究，国外学界也有对《淮南子》的关注：美国学者安乐哲（Roger T. Ames），不仅将《淮南子》译出英文版本，并且在其 *Thinking from the Han: Self, Truth, 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e Art of Rulership: A Study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主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以及若干单篇论文中论述了西方人眼中的《淮南子》一书。《剑桥中国秦汉史》作者之一的英国人鲁惟一，将《淮南子》作为汉代宗教和知识文化的综合性著作加以研究。Griet Vankeerberghen 在 *The Huainanzi and Liu An's Claim to Moral Authority* 一书中将《淮南子》放在西方道德哲学的视野中加以考量。此外，日本学者对于《淮南子》也多有研究，并且大致沿袭中国传统研究方法，如本田济、金谷治、宇野茂彦、田中麻纱、马场英雄、有马卓也等都有相关研究成果。据何宁《日本淮南子书录》一书的叙述，日本 18 世纪至 20 世纪 70 年代关于《淮南子》共有 37 种研究著作问世，其对《淮南子》研究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鉴于当前对《淮南子》研究现状的综述，我们认为《淮南子》的研究大致可分为综合性研究与专题研究两类。就前者而言，由于它试图将《淮南子》一书的内容搜罗殆尽，在把握其整体风貌方面当然有其优势，然而对于一部“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①的书，当我们想要从整体论述其全部思想内容的时候似乎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一般性论述与介绍当中，这样的论述与介绍作为初期的研究当然有其价值和意义，但它也在有意无意间阻碍了对于《淮南子》思想研究的深入挖掘。就后者而论，目前针对《淮南子》的专题研究或针对其某一具体思想进行，或将其放在某一大学科背景下进行，这些研究性著作在推进《淮南子》微观研究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针对其某一思想的研究由于缺少对于《淮南子》一书的整体把握，往往会有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弊端，而以某一大学科，比如哲学、美学、文学等为参照进行的研究较之综合性研究虽然有所深入，但仍然没有把

^① 《淮南子·要略》。本书主要依据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为研究底本。以下所引《淮南子》原文皆出于此书，个别断句标点有所更改。

握住《淮南子》一书论说的核心来进行,因此仍然流于泛泛。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对于《淮南子》的把握试图在对此书综合性认知的同时,侧重于从生命艺术思想的角度出发,将其宇宙论、人性思想以及文艺观统摄于这一思想之中。之所以可以这样做,一方面由于目前生命哲学美学的发展已经为此类研究提供了可供阐释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也是由《淮南子》一书的特点,即对于“生命”本身的关注所决定的。

二、理论背景

从生命思想的角度对《淮南子》进行研究不得不提到西方生命哲学美学的学术背景。生命哲学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期在德、法等国流行的一种重要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美学思潮。从总体而言,生命哲学的主题基本上与生命本身,特别是人的生命、人性有关。它本质上是在通过对人的现实存在状况及理想存在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彰显出生命的价值,并将其上升到美学、哲学的层面加以思索。这无疑与近世以来的“人本主义”转向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其理论对象是围绕人的存在,探讨诸如:人的个体或群体生命、人的现实或理想生活、人的正常或非正常心理状态、人的历史文化流变等问题。在探讨人与外在环境、自我与他者、自我与自我的对立、冲突或调和、对话的过程中生发并建构起对于人与周围世界关系的理论。

与其他美学流派相比,生命哲学美学似乎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对此有学者指出:“从广义来看,所谓‘生命’,就是指人的生命,因此,现代西方美学史上几乎所有的人本主义美学流派,譬如唯意志主义美学、表现主义美学、精神分析学美学、实用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和存在主义美学等等,都可以称之为生命美学。从狭义来看,生命美学则专指 19 世纪末在德法产生的,以关注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借助肯定人的生命价值来冲决理性绝对主义美学观念的一种思潮。”^①

可见,从最为广泛的生命范畴来看,它与人本主义的美学思潮和非理性主义的研究理路一脉相承,诸多哲学美学流派及其思想均可包容其中,这就使得广义上的生命哲学美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主张和一脉相承的发展历程。也正因为如此,作为本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背景的生命美学是从狭义的层面对生命哲学美学的圈定。即便如此,这一理论主张依然呈现出纷繁斑杂的形态。从时间跨度上来说,从 19 世纪 8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是生

^① 朱鹏飞:《生命哲学美学的历史流变及其基本特征》,《社会科学战线》2007 年第 1 期。

命哲学美学在理论层面的兴盛时期,放在漫长的西方美学历程中,这段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正是在这 50 年左右的时间里以非理性主义为理路号召,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观念、思潮不断涌现。如果说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都认为世界不是由理性规定的,从而显得极为机械刻板必然化的公式存在;而是四处洋溢着生命的激情,从而被诸如偶然、暂时性、可能性、模糊感统摄的虽捉摸不透却魅力无穷的艺术的、审美的存在。

虽然这些理论家们对“生命”的具体理解受到学术背景、地域风气、个人兴趣等左右,从而并非完全一致。但仍可以梳理出一条或隐或显的生命哲学美学的探索路径。最早将生命哲学加以命名的是卡尔·菲力浦·莫里兹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莫里兹在《生命哲学论文》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生命哲学”这一名称,他使用这一名称的目的是为了能将一直高高在上的、形而上的哲学探究,运用、扩展到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说,使用“生命哲学”这一概念,是为了区别传统哲学的思考路径而显现出一种新的哲学探究的目的,那就是尽力避免纯粹的抽象命题的探讨,转而关注现实中人的生命存在。除此之外,施莱格尔则在他的《关于生命哲学的三次讲演》中批判黑格尔的那种对于“绝对”思想不加甄别的推崇,提出要抛弃掉黑格尔哲学的绝对性。为此,他将经验、信念、感性等关乎人的情感生命的词汇与理性的代表智力对立起来,深入研究人在感性体验中所体现出的生命的激情和冲动,并试图建立以人的生命、生活、心灵归属为核心范畴的生命哲学。对此进一步的阐释在其后所作的《论道德上的美和生命哲学》的著作中。在此著作中,他以生命哲学美学与艺术的相互关系进行论证,从而试图对传统哲学的研究理路进行批判,甚至直接提出为了能够更加合理地理解、解释艺术,必然要放弃过去司空见惯的对于理论和体系的无限推崇。生命哲学,应当转而按照情感或者心灵在人类生命中的地位和表现,彰显出以心灵为存在方式的人的生命的力量和特性。

可以看出,“生命哲学”作为概念名称可以基本确认其提出者和相关论著,作为一种学术探讨的思路也可以大致厘清其与传统哲学美学的差异。但是,由于生命哲学从开始出现就作为理性体系的对立面,不以建立理性的体系为目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形成比较固定的理论观念和主张。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生命哲学美学在研究思路上和关照视野上相对以往学术探究的转变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具体观念、观点的阐释意义。于是,在不同学科背景的使用过程中,生命美学具有了某种泛化的可能性。因此,当生命哲学中的“生命”概念被理解为与个体自然生命现实存在的方式以及作为生物的一

个部分参与到生物进化的历程中时,这时的“生命”范畴无疑会带有较为强烈的自然科学中生物学的因素,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带有生物学倾向的生命哲学美学。而当生命哲学中的“生命”概念被理解为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制度下人的现实生活状态的时候,这时的“生命”范畴则会带有历史文化的印记。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带有历史文化倾向的生命哲学。此外,如果生命哲学中的“生命”概念被理解为与身体或灵魂的死亡、毁灭相对立的生存状态时,这时的“生命”范畴又必然会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可以说,这是一种类似于存在主义的生命哲学。

虽然从宏观上考量,生命哲学美学是一个略显泛化的理论概念,一条远非清晰的理论历程,但围绕“生命意志”的命题还是可以看出其理论的旨归和论述的目的。从生命意志的角度入手,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为代表的哲学家们或把世界认为是生命意志的表象,从而从生命的角度去建构世界的存在意义;或把生命意志向上诉求,从而发展为一种权力意志,以此来扭转现实中个体生命的短暂和脆弱;或直接认为世界的存在本就是生命冲动和创化的绵延过程,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出发,在物理的、机械的,从而也是不变的、僵死的世界中发现生命现象和生命激情的欣喜,从而认定生命是一种向上的冲动,生命的本质是创造。离开了生命的冲动,本然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

可以说,自叔本华以后,生命主题越来越成为思想界关注的焦点,除了尼采、柏格森,狄尔泰从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中来关照生命的精神,社会、历史、心理,但凡和人的生命有关的理论都被运用来研究人的生命精神。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阐释与反思之后,狄尔泰毅然反对将人看作单纯认知的主体,强调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人的认识,事实上是知、情、意的统一。过分强调理性认知的结果只会造成对生命认识的割裂和曲解。从而进一步认为,理解活动并不是传统中认为的理性反思过程,恰恰相反,真正的理解活动是以生命的感受、生命的体验或表现为引导,由于人在普遍意义上体验、感受的一致性,就为进入他人内在生命感受提供了可能。在这一理解概念的统摄下,狄尔泰将个体的生命扩展到他人的生命和人类的类生命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近似于“推己及人”式的理解、阐释路径。

此后,哲学人类学家马克斯·舍勒从多学科的综合角度继续对生命的状况做详尽的分析,通过比较人与其他动物生命状况的异同,阐释人的精神本质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

西方思想界对“生命”观念的认知历程伴随着人本主义的思潮而出现并

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理论家的共同关注下,“生命”,这一原本是纯粹生物学上的概念逐渐从纯生物的含义蜕变为具有本体色彩的哲学命题。“生命”概念中所包含的意义逐渐凸现出来、丰富起来。具而言之,一方面,生命从其原初的生物学意义逐渐生发出激情、直觉、感性、欲望,转变为具有越来越浓烈的非理性色彩的命题,伴随着这一转变,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非理性是比理性更加基础的东西,生命的非理性是理性寄居的土壤,从而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和生命的本体相融合。另一方面,生命成为人现实存在的原初起点,“生命”一词意味着人在本源状态下的完整与和谐。在这种意义之下,生命便等同于存在本身,是一种“圆满”的存在状态。

总体来说,西方生命哲学似乎并不执着于一劳永逸地解决并规定生命是什么的问题,而是致力于探讨原初状态下的生命所具有的一系列特性,并以此作为他们理论的基点。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说,生命哲学所要揭示的生命的根本特性大致包括生命的有限性、生命的无限可能性、生命的独特性和生命的超越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生命的脆弱性、生命的偶然性等问题。

以上是关于西方生命哲学的大致论述。在中国美学史上,对生命的思考和论述也一直存在。仅以近现代的情况来看,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就运用叔本华关于生命冲动的思想来分析这一经典作品,而其《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实际上是对生命本身所具有的情感性、体验性的表达。宗白华在对“意境”的阐释中也洋溢着生命意识的关照,他说:“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默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①并认为:“美是丰富的生命在和谐的形式中。”^②

宗白华所谓的“意境”是饱含着生命激情的创构。正因为有了生命的融入,有了人的审美视野的关照,所谓艺术的“境界”才不是纯然的对于自然本身的摹写,从而在根本上超越了艺术“模仿”的观念所导致的反映论似的机械感,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模仿”的观念有可能导致的对于艺术存在价值的怀疑。^③吕澄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说:“美感只是对生命展开的快

①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

②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

③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有对于诗人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怀疑。

感。”^①与之相对,如果生命受到了压抑,并由这种压抑而产生扭曲而非自由顺畅则是“丑”。可见,吕澄对美感的界定也是以人的生命本性作为出发点和最终旨归的。此外,封孝伦认为,人的生命应由“生物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三重生命组成。^②并以这三重生命为视野重新审视美学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所在。黎启全则认为:“美的本质就是人的生命活力的自由表现。”^③可以看出,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生命”问题的关注,中国美学中关于“生命”这一范畴的体认也逐渐走向深化。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生命”范畴的内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和扩充,从而使得这一范畴从生物的意义逐渐具有了社会性、精神性的含义。其二,以“生命”为理论视野重新阐发当代美学的意义和价值。对此,潘之常说:“美学必须以人类自身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的现代视界,换言之,美学倘若不在人类自身生命活动的基地上重新建构自身,它就永远是无根的美学、冷冰冰的美学,它就休想有所作为。”^④事实上,当潘之常以“生命美学”为号召来重新界定当代美学的理论视界时,在一定意义上实现的是对于当代美学的再次建构。虽然他似乎并没有完全摆脱实践美学的理论印记,但从人的精神的超越性入手,至少部分实现了对传统美学视野和界限的突破。

以跨文化比较为理论语境,朱良志指出:“中国和西方原属不同的文明,其思想也有根本的差异。粗而言之,中国哲学重在生命,西方传统哲学重在理性、知识。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它将宇宙和人生视为一大生命,一流动欢畅之大全体。生命之间彼摄互荡,浑然一体。我心之主宰,就是天地万物之主宰。人超越外在的物质世界,融入宇宙生命世界中,伸展自己的性灵,则为中国哲学关心的中心。”并认为:“在这样哲学背景下产生的美学,它不是西方感性学或感觉学意义上的美学,而是生命超越之学;中国美学主要是生命体验和超越的学说,它是生命超越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⑤可以看出,在中国美学的传统理路中,“生命”本就作为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显现在传统的美学历史中,甚至可以说,“生命”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底色,它是一条

① 吕澄:《美育浅说》,胡经之编:《中国现代美学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② 封孝伦:《人类生命系统中的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③ 黎启全:《关于“美的概念”》,《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2期。

④ 潘之常:《生命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⑤ 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引言。

脉络,将宇宙、人生、美学、艺术串联在一起。离开了“生命”的视阈,对中国传统美学中基本文献的理解、阐释多多少少会有些隔靴搔痒之感。

以上我们大略梳理了西方生命哲学美学和我国以“生命”为核心范畴的美学历程。可以看出,从生命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解读已经具备了相应的学术背景和方法。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的生命哲学思想毕竟是在其所独有的学术背景下提出的,以“生命”为号召,事实上是为了扭转传统哲学美学中对于理性的过分推崇,甚至可以说,“生命”这一概念更多地作为非理性精神的表征,用来对抗强大的理性传统。就这层意义来说,西方生命哲学家们所要解决的思想困境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或许并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从中抽取出对于“生命”范畴的体认和运用加以借鉴。就我国生命美学的发展状况来看,传统哲学美学理路涉及生命的范畴,同时,其理论的归宿也可阐释为生命的精神。从宏观上来说,同样在论述“生命”的范畴,西方的生命哲学美学更多关注于生命的偶然、生命的欲望、生命的激情,以及生命的不确定性。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生命精神则侧重于阐发精神生命对于现实人生的超越意识。因此,当西方的生命美学以“生命”为非理性的表征对强大的理性传统宣战时,我国美学中的生命精神则一次次体现出对于现实生命有限性的内在超越。这当然是两种不同的对于“生命”范畴的理解,作为对文本解读的视野和方法,这种不同并不会对《淮南子》的生命艺术解读造成困惑;相反的,这种不同,以及由于不同所造成的理论张力,恰恰可以用来深化对《淮南子》的理解。事实上,两种对“生命”范畴的解读在《淮南子》一书中都有所体现。当然,在试图用上述方法进行阐释的同时,本书论述的落脚点依然是中国传统思想本身。

三、《淮南子》关注生命问题的原因分析

既然以“生命”为研究视野,在进行《淮南子》文本解读之前,需要考察该书关注生命问题的原因,这牵涉到将《淮南子》放在生命艺术中加以考察的合理性。因此,采用“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方法,从编书者刘安的一己遭遇入手,通过对其现实生命悲剧的分析,透视出《淮南子》成书的背景,以及论述的落脚点。历史上,对于刘安的记载除《史记》《汉书》立传之外几乎见不

到更为全面的叙述。甚至对于刘安究竟是否真正谋反也存有争议。^①可见,对刘安生平的认识在许多方面仍是含糊不清的,但比较明确的是刘安是以“谋反”的罪名自杀身亡的,这一事件发生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其出现似乎并非偶然,通过对刘安悲剧原因的分析,或许可以一窥《淮南子》之所以对生命问题尤其关注的根源所在。具体来看,刘安“不合时宜”的思想状况和身处忧患的生活背景可以从他与中央政权的三个矛盾得到揭示:

矛盾一,聚众养士以求扩张实力的个人意愿与中央政权力求社会稳定的诉求相冲突。养士之风自战国时期开始盛行,当时战乱纷争不断的社会状况使得各诸侯国尤为重视对于各方面人才的吸纳,甚至可以说人才的有无和多寡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各诸侯国的存亡。于是各国国君争相礼贤下士,招揽人才为己所用。如以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为代表,当时养士的数量甚至已达数千以上。自战国开始盛行的养士之风到西汉初年依然不减,作为本身就有着相当政治诉求甚至政治野心的诸侯王,刘安在这一社会风气的浸染下也借重养士之名广纳人才,从而一方面,借以稳固甚至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为将来的变数及早谋划。但是,从中央集权、皇权稳定的角度上来看,王侯如此大规模的养士之举不得不对中央权威的一个潜在威胁。当人才日益汇聚到诸侯王的身边,伴随着诸侯国实力的增长,事实上并未形成对中央政权的巩固,相反的,这些实力大增的诸侯王极易聚众滋事损害王权威信,甚至忤逆谋反,推翻当时的中央政权。可以说,聚众养士之风的兴盛如暗流涌动,严重威胁了中央政权的家国稳定。正是看到了这一威胁,汉武帝对王侯养士之风深恶痛绝,亲政不久就打击了一批聚众养士的高官显贵。比如,魏其侯窦婴在和武安侯田蚡争权的斗争中,很大程度上就是被人抓住聚众养士的问题,进一步被恶意曲解为有意图谋反的重大嫌疑而被弃世。此外,大侠郭解最终的悲剧命运也和他养士众多又恃才傲物有关,最终在汉武帝的授意下,被公孙弘网罗罪名而终被灭族。

可见,在刘安之前,无论是权倾四野的重臣还是英气毕露的豪强,只要牵涉到聚众养士的问题,最终大多是以悲剧结局。刘安作为诸侯王,其实力的逐渐扩张可以说是从养士中得益,但时移世变,当中央政权意识到王侯养

^① 司马迁在《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认为刘安谋反是事实,“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叛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后,班固《汉书》、司马光《资治通鉴》均持此看法。相反的,徐复观认为刘安谋反是无中生有,刘安是含冤而亡。对此的详细论述可参阅王云度的《刘安评传》。